

民國文學觀念

民國文學觀念

西南聯大文學例論

李光榮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民国文学观念

西南联大文学例论

李光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李光荣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08798-8

I.①民… II.①李… III.①西南联合大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民国 IV.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419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民国文学观念
西南联大文学例论
李光荣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ISBN 978-7-100-08798-8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960×1360 1/16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

定价:58.00 元

序

初识李光荣先生，是二十年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时，光荣在文学研究所樊骏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我们都是性格内向的人，当时又都忙于各自的事情，交流不算多，但光荣执着的学术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都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的工作，交流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每逢见面，光荣必谈学术。记得大概是2004年徐州理事会期间，光荣说起自己想做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樊骏先生与钱理群先生都支持他做这一选题。西南联大集中了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沈从文等一批学者、作家，也培养出穆旦、杜运燮、郑敏、林蒲、王佐良、何达、袁可嘉、汪曾祺等一代年轻作家，西南联大文学是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确有研究价值，并且光荣作为云南人，又曾在西南联大分校、本部的驻地蒙自、昆明学习、工作过多年，对西南联大的风土人情背景十分熟稔，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也对他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满怀期待。光荣肯下苦功，又有独辟蹊径的眼光与勇气，因而在学术探索中总能有所发现。有一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近百篇，当我要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选编年会论文专辑时，毫不犹豫地选中了光荣的《彝族歌舞与闻一多〈悬解〉的诞生》，因为这篇论文提供了现代文学界未曾注意的新材料，分析中肯而有说服力。光荣在发掘材料方面下了极大的工夫，除了翻阅原始报刊、钩稽多种文献之外，还访问联大师生及其亲友，获得了

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他掌握的作品数量，可以辑成一套西南联大文学丛书，只是由于经费的缘故，才先出版了一部入选“中国文库”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2011 年 12 月，李光荣与宣淑君合著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可以说没有辜负樊骏先生与钱理群先生的厚望，自然而然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掌握了那么多的西南联大文学资料，以光荣的性格，他必定会继续探究下去。我得以先睹为快的这部书稿——《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即是新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之新不仅在于使用了不少新材料，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引入了民国文学观念，以此来考察西南联大文学，这无论是对于考察对象本身，还是对于整个民国文学史的建构，均有独到的贡献。

光荣是较早提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学者之一。说来惭愧，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学术会议，我大半在学术组负责会议发言的安排，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与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教授先后报过关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发言题目，我当时担心政治上有风险，没有将其列入大会发言。直到 2005 年我在考察鲁迅对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思潮的评价问题与正面战场文学问题时意识到了民国史视角的必要性，才觉察出自己以前担心与回避民国文学观念的幼稚，为此不禁汗颜。现代文学在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其起伏跌宕的历史脉络、多元交织的整体格局、复杂深邃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五色缤纷的文体风格，都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谈民国文学呢？现代文学气象万千，可以从不同视角予以考察，民国文学固然不是唯一的视角，但至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效视角。

几年来，光荣就民国文学问题发表过系列论文，如《论民国文学研究与当下史料工作问题》、《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史的缺位》等。最初从中国文学史断代史命名的通例来谈民国文学史

命名的合理性，继而涉及民国文学的背景还原与意义追寻。这部《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便已进入到背景与意义的层面。如在考察“西南联大文学的生成环境”时，就指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云南地方当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与科学规划，否则不可能有西南联大在昆明等地的立足与发展；“西南联大文学的学生团队”与“西南联大的民国文学宿将”两章揭示出西南联大尽管隶属于教育部的管辖，但办学仍有不小的独立空间，“党义课”实际上被置于搁浅的境地，教授会行使着民主的权利，训导处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审发贷金与补助，办理社团与壁报登记，对学生并无严苛的压制，更无残酷的打击，反倒是学生与政府发生矛盾之后，学校想方设法保护学生。所以，西南联大才有那么多的文学社团，社团所办报纸杂志与壁报才有多种色彩与多样风格。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坚持民主、自由精神，保持独立的个性，即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碑文》中所说“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从而给西南联大文学百花盛开提供丰腴的土壤与温润的氛围，正是孙中山创建民国时奠定的民国机制在起作用。

有的批评者把“民国机制”说成是学者的想象，其实不然，“民国机制”只是民国制度及其功能的一种表述。民国不是铁板一块，有独裁与民主的冲突、党部与政府的罅隙、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此地与彼地的差异。龙云执政云南时，不仅大力支持教育事业，而且尽量保护有左翼色彩的学生，使得国民党特务欲抓捕学生而难以得逞，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对峙与抗衡，在皇帝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到了民国才有可能。西南联大文学不仅有现代主义，也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而这样的特征也是民国文化自由性、包容性的表征。民国历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了变数，政府数度更迭，政策起伏多变，道路曲折坎坷，抗战胜利之后，反内战的学生惨遭杀

害，则是民国机制蜕变甚至日渐消泯的征候。

民国时期的文学，只有还原到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才能够理清其来龙去脉，才能读出其内含的民国意义与韵味。光荣的这部专著便是一个很有力的实证。抗战时期民国背景下在“彩云之南”孕育养成的西南联大文学，姹紫嫣红，魅力迷人，自然不是一两部专著能够说尽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光荣才称此书为“例论”。西南民族大学成立了民国文学研究中心，我相信，主持这一中心工作的李光荣教授，一定会在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乃至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中做出新的成绩。

按说作序应该请学术前辈，而我只是比光荣年长几岁，难当此任。但我与光荣相交既久，且同代人的学术探索多有相通之处，所以也就不揣冒昧，勉为其难了。好在书卷打开，读者自然会有收获，无须在意我在前面说对说错。

张中夏

2013年12月9日于上海交通大学

目 录

1 序

1 前 言 民国意识与西南联大研究新视角

16 第一章 西南联大文学的生成环境

17 第一节 战时社会环境

44 第二节 学校教育空间

58 第三节 “五四”精神源流

73 第四节 新文学传统

90 第五节 外国文学气息

108 第六节 地方文化氛围

127 第二章 西南联大文学的学生团队

129 第一节 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的管理

141 第二节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组织

156 第三节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活动

177 第四节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特点

207 **第三章 西南联大的民国文学宿将**

209 第一节 朱自清在云南的文学活动

244 第二节 闻一多在云南的文学活动

281 第三节 沈从文在云南的文学活动

311 **第四章 西南联大学生的反战文学**

313 第一节 西迁路上的硕果

324 第二节 穆旦的抗日战争

348 第三节 杨明的兵役批判

358 第四节 战争的人性反思

389 第五节 阻止内战的努力

398 第六节 抗议暴行的呐喊

406 **参考文献**

413 **跋**

前言

民国意识与西南联大研究新视角

2003年以来，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观念——民国文学在学术界悄然兴起。民国文学观要求把中国相应时间段的文学放在民国社会文化中去研究。而这段时间正好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所以民国文学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首先提出并运用。说“首先”，是就文学界而言的。其实在其他学界，如历史、经济、政治、教育等学科，早已使用了“民国”概念。民国文学或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取用，使我国1912—1949年的文学得到了历史的依托。说穿了，民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和运用，是一种“回到历史”的思想观念的实际体现。取用了民国文学概念，“中国现代文学史”再不是可以任意伸缩的弹性历史了。

在中国文学史中，无论古代文学因素如何变化，都是断代史，可是，“近代”以下“中国文学史”就不写了，意即“中国文学”止于民国。这是不合理的。“中华民国”是我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

国名，必然而且已经是我国历史纪年的一个阶段，是绕不过去的。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也是不能长期用“中国当代文学史”指称的。取用了中华民国文学史，就贯通了中国文学史的河流，不再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排除在“中国文学史”之外；同时 20 世纪的文言作品、少数民族文学、华文文学等进入这段中国文学史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因此，民国文学观念大有勃兴之势。

西南联大是民国的一所大学，其历史及文学打上了清晰而深刻的民国烙印。研究西南联大及其文学，必须具备民国意识，从民国视角进入，在民国社会的政治、教育、文化、经济、战争、交通、商业等环境中进行“定位”考察，才能研究得准确到位，说清问题。也只有这样，所研究的才是“西南联大”，而不是其他的大学。这种思维方法的基点是民国意识，由民国意识出发的观察为民国视角，观察所见的区域即民国视域。在民国意识以及民国文学观念的建构过程中，本人参与了概念的提出、阐释并较早地进行具体研究。我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西南联大及其文学，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个案进行考察，企图把西南联大做成民国文学研究的范例。本书即是运用民国意识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初步尝试，意味着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中民国文学研究观念的诞生。

—

1937 年 11 月 1 日，西南联大在长沙开学，初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抗战壮举中的一项功在千秋的伟业。虽然，在抗战初兴时民国政府对抗战的长久性缺乏认识，教育部把开办临时大学的意义局限在“为使抗敌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

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①，目光显得短见，但是，随着全国主要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抗战速决论破产，政府接着调整了思路，确立了“战时如平时”的办学方针，制定了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的长远目标。当战火威胁长沙之时，民国政府再一次同意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临大鉴于云南的区位优势 and 对外交通联络的便利，决定迁往昆明并得到国家教育部的批准。这一次迁徙，是在举国西南大转移的情形中进行的，局势的紧迫，交通的拥挤，事务的繁多可想而知，因此此举充分显示了政府对于办教育的重视。

到了昆明，云南省政府和昆明市给予热情接待。省主席龙云曾先后批文解决西南联大的校舍问题，并主动把自家的住宅让出一部分给教授居住。无奈此时涌入昆明的机构与人口太多，无法解决全部校舍问题，西南联大只好把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设在蒙自。在蒙自，县政府出面帮助，士绅腾出自家房屋作为校舍，虽有商人提高膳食标准之事，但有识之士是竭诚欢迎的。李县长曾派四十多名保安守卫位于城外的学校，夜间则护送女生回城里的宿舍，政府及地方名士多次请教授吃饭并与他们交往，结下了友谊。在昆明，政府协助学校购买土地修建新校舍，使西南联大“安营扎寨”，安心育人。当物价飞涨，居之不易的时候，政府还为学校提供公米。老百姓则以象征性的价钱出租房屋给师生，形成了“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的特殊景观，学校附近居民有的以开茶馆的方式提供学生的自习场所，当日本飞机轰炸昆明，老师又移居到附近小镇的居民或农民家中，与他们共一屋檐下，朝夕相处，感情深厚，有的甚至把这份感情延续到了下一代。

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联大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在民国政府的眼皮

^① 见“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载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1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底下。常言道：山高皇帝远。远离政治中心使西南联大获得了许多自由。无论政府办学的初衷如何，在战况日益凶险，丢城失地逐渐增多的局势下，西南联大师生自觉承担起了文化的使命，以传承中华文化、推进科技进步为己任，老师孜孜于研究以创造，学生矻矻于学业而成才，形成了爱国、民主、自由、科学、刻苦、创新的精神和学风。他们心里有一个崇高的理念：国家和民族，而实现国家中兴、民族强大的途径是继承和创造文化，因此，他们把教学看得很神圣，把养成抗战建国的人才作为工作的核心。在物价暴涨、生活困顿的时候，有老师去校外兼课，或者兼开商店、包工程、做肥皂、刻图章，甚至出卖知识与名声去写碑文，但没有谁辞职经商去发“国难财”的，因为他们的兼职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目的是传承文化薪火，造就建设国家的人才。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国家观念和文化使命以及山高皇帝远的条件，西南联大能够对学术创造和人才培养关系不大的东西，无论来自哪个方面，哪怕是上级的指令都可能进行抵制。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对大学的管理日严。1938年秋，教育部颁布《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之后，又陆续颁布各系必修课程表，部订教材以及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企图将大学教育整齐划一。西南联大教授认为不妥，遂召开教务会议，通过呈文，请学校向教育部反映不予执行。教育部见文后，默许西南联大对其指令变通处理。

在“民国视域”中，还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的“半独立”状态。民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不统一，政令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虽然各省政权都承认民国政府为中央政府，愿意听命于中央，但许多省都是军阀独占，割据一方，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云南省即属这种情况。省主席龙云具有进取精神，对云南的发展建设尽心竭力，要努力创建一个“新云南”，但他对中央政府保持着警惕，严密防止中央政权的渗透，独自控制着云南大权，甚至发行地方货币，保持经济的独立，即使到了抗战时期局势异常紧张的时候，也不让中央军驻扎在

昆明城内，他在云南实行既归属民国中央，又独立行使政策法规的统治。蒋介石对龙云心知肚明，虽不满甚至怨恨，但只好听任之。正是云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差异与矛盾空隙，给西南联大的办学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龙云又是一个开明进步的官员，他尊重文化人，不压制民主自由，后来还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学生游行，他派警察维持秩序；“皖南事变”后，学生党员身处危境，他通风报信；“倒孔运动”后，中央政府派人来抓捕学生，他予以抵制。龙云和他领导的云南省政府不但为西南联大办学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条件，还是西南联大民主自由运动的同情者，也是西南联大政治与人权的保护伞。蒋介石对龙云由不满到仇视，抗战胜利，终于软禁了他。龙云下台，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虽然全市学生坚持斗争取得了“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除鲜血和生命外，还有学业，甚至包括西南联大的仓促结束。所以，在总结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时，有学生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联大不是设在云南，而是设在大后方的其他地方……西南联大也就绝不可能有那样大的成就和贡献。”^①

二

作为一所战争时期流亡迁徙，匆促办学，条件极差的大学，西南联大的成就真有那么大吗？

衡量教育水平的最终标准是学校培养的学生。而学生的质量是在十几年、几十年后才充分显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一所学校办学水平最客观的评定不仅在当时，更在数十年之后，所谓百年树人。考评一所学校，当时所能见到的是“大师”、“高楼”及设备条件，即今所说

① 李曦沐：“西南联大——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的软件和硬件，所能感受到的是教师学问的深浅、讲课水平的高低等。而其软硬件的好坏、教学的深浅优劣对于造就人才的效果，是将来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的。之所以说西南联大教育成果显著，是数十年后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在文化岗位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众多举世瞩目的成绩，为科学文化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他们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总会提起自己的母校，感谢西南联大给予自己的良好教育，杨振宁、李政道、邹承鲁、朱光亚、黄昆、王希季、王汉斌、彭佩云、任继愈、林抡元、汪曾祺、杜运燮、沈克琦等，无不这样。

由于各种原因，西南联大湮没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不知道”有西南联大，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家政治气氛宽松，西南联大才浮出水面。那时，北京、昆明、天津、上海、广东等地相继成立了西南联大校友会。校友会开展多种活动，编辑《校友会简讯》，北京校友会还成立了“校史组”广泛开展校史资料征集工作。西南联大随着这些活动渐渐为人所知。而1980年，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体的“北京老同学合唱团”成立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场演出，随着电视节目播出和报刊杂志刊载，西南联大“走”遍了全国，传向了世界。这期间，一本本重要的书籍相继出版，1986年《笛吹弦诵在春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1988年《笛吹弦诵情弥切》、《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1994年《西南联大在蒙自》，1995年《西南联大教育史》，1997年《西南联大现代诗钞》，1998年《内迁院校在云南》、《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和《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2000年《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等，这些著作，既是西南联大研究的重要成果，又为新的西南联大研究提供了史料、线索、思想，推动了西南联大研究向纵深发展。尤其是199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为广大读者了解西南联大提供了较为完整、翔实、准确的读物，虽然书中还有一些瑕疵，但对于

人们认识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就与历史面貌给予了最基本也是较权威的阐释，是西南联大研究中最重要学术成果。应该特别一提的是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学者易社强1988年出版的英文版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二书。前一本为丛书《学府纪闻》之一种，收录台湾的西南联大师生当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文章和后来对西南联大的回忆。当时海峡两岸的关系尚未解冻，作者不可能回国考察，数十年前的情况在记忆中必然有变形或差错，但在总体上反映了西南联大面貌，有许多是弥足珍贵的史料，且从另一个角度看西南联大，揭示出一些新东西，尤其可贵的是，它作为西南联大研究的先声，对大陆的西南联大研究产生了影响。后一本书则是作者在二十年的研究中，走访了在美国、英国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上百位校友，到长沙、昆明、蒙自、叙永做实地考察，查阅了美国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诸多图书、报刊和档案而后写成的。虽然书中的某些观点与大陆的意识有相当的出入甚至抵触，但全书是作者的独立见解，是另一种思想意识指导下对西南联大的认识，属于另一种声音。无论中国大陆、台湾，还是美国的著作，都充分肯定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和业绩。以上成果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南联大研究得以展开，其特点是稳步推进、深入发展，虽然波澜不惊，但硕果累累，成绩卓著，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后，回忆式的文章已不再是研究的主体，西南联大师生也不再是研究的主力，连他们所编的几本史料书中的多数文章都不再是新写的回忆，多为历年文章的编选，同时收入了部分后学研究者写的文章，如《西南联大精神永垂云南》和《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这时涌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者，出版了一些新书。由于年纪较年轻的研究者缺乏西南联大的生活经历，又没有查阅可靠的史料并进行实地考察，有的书中不免存在牵强附会之处。但有的作者舍得花工夫，收集

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学问功底深厚，笔调轻松，较有可读性，如《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这时期除新学者的涌现外，另一特色是对故旧史料的发掘并获得了研究的突破，其代表是《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和《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二书。近几年，为迎合市场需要，出现了一些逸事连缀、捕风捉影、趣闻引申的著作，虽然无伤大雅，但亦无关宏旨，既无新材料，又无新观点，对研究无意义，这是应当警惕的。

总之，西南联大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西南联大师生率先，对西南联大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和眼光，描述了西南联大的基本事实，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并且对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教学、学术和生活等进行概括和总结，得出许多具有科学性的结论，为西南联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它是研究西南联大的案头读本，此书修订后于 2006 年再版，在西南联大研究史上地位崇高。继之而起的是后来者的研究。后来者以新的知识和眼光去看西南联大，得出了许多与西南联大亲历者不同的认识。他们不仅以新的理论去阐释西南联大，还注意史料的发掘、实地的考察和独特的感受，尤其是拥有独立的史料准备，因此，所写的东西不同于前人而有所突破和创新。其中观点新颖、内容丰富、材料扎实、影响较大的著作是《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①和《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等。可以断定，沿着史料的路子走下去，必定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就在这时，历史又一次露出了笑脸，新的研究观念尝试成功了。

① [美] 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